

西泠印社

马衡研究专辑



XILI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ARTS

总第二十九辑

社编

出版社



| 主编导语 | LEAD EDITOR |

陈振濂

马衡先生虽未列创社四君子之列，但他却是西泠印社最早期的创社社员。马衡先生擅书法，精篆刻，而对于近代“金石学”则有奠基之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且是一个从古典学者转型为近现代文史专家的学者。他的《凡将斋金石丛稿》是斯界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西泠印社当下提倡“重振金石学”之际，编撰一组关于马衡先生的研究论文，俾使我社诸君全面了解马衡作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在学术上的丰功伟绩及其对西泠印社的贡献，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马衡还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故宫服务几十年，亲自组织了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大迁移和解放战争时期把故宫文物留存新中国的许多重大工程，体现出一个知识份子的铮铮铁骨与爱国主义情怀。西泠印社之有马衡，是西泠印社的骄傲。本辑《马衡研究专辑》的推出，不仅是我们对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的追思与仰慕，更应该被看作是西泠印社中人忧国忧民，在时代大动荡中如何以一己之绵力，以泰山不移其志的坚定信仰，为祖国、为民族、为文化义无反顾地奉献与牺牲的种种可歌可泣事迹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其实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还有许多。西泠印社近期活动频繁，西泠印社社友会与书画篆刻学院余杭分院揭牌；“西泠八家篆刻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展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西泠印社2011艺术研究规划向社会公开课题招标。此外，刘江、韩天衡、胡效琦、韩焕峰、李刚田等，青年才俊陈墨、郭超英、唐存才、张炜羽、蔡毅强、金良良、洪亮、沈慧兴、歧岖、沈乐平等均有创作展览与理论研究之成果问世。各种有益于印社发展的信息纷至沓来，一则表明了西泠印社蓬勃兴旺，后继有人；二则也证明了西泠印社的繁荣昌盛有赖于社员个人的努力奉献。西泠印社是一个“雅集”色彩颇浓的文人士大夫社团。在过去，它对于社员个人活动的倚重，有时还大于社团集体运营策划的活动。这种从近百年来形成的好传统，今天我们绝不能丢。

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在即，希望有更多的社员们到杭州西子湖畔来体会西泠印社以“雅集”为特征，坚持“守望孤岛”，以此自我定位的历史涵义，并从中品味出西泠印社的独特魅力所在。

2011年3月18日于孤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泠印社. 第29辑, 马衡研究专辑 / 西泠印社编.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508-0041-0

I. ①西… II. ①西… III. ①艺术—杭
州市—丛刊②马衡(1881~1955)—人物研究 IV.
①J12-55②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2038号

《西泠印社》编辑委员会

主任 启功

副主任 郭仲选 刘江 朱关田

程十发 韩天衡 陈振濂

魏皓奔 童衍方 李刚田

编委 包正彦 黄镇中 金鉴才

余正 熊伯齐 孙慰祖

祝遂之 孙其峰 杨鲁安

主编 陈振濂

副主编 包正彦 赵一文 黄镇中

江吟

编辑 (姓氏笔画为序)

王佩智 邓京 叶莹

吕金柱 朱妙根 吴莹

邱云 余成 张钰霖

侯辉 顾祥森 郭超英

桑建华

责任编辑 侯辉

执行编辑 郭超英 叶莹

封面篆刻 贾鹏

出版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层

邮编 310014

编者 西泠印社

地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层

邮编 310014

电话 0571-85812993

传真 0571-85812974

网址 www.xlys1904.com

电子信箱 xlys_1904@163.com

xlysshekan@sina.com

设计制作 西泠印社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6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书号 978-7-5508-0041-0

定价 28.00元

| 主辅导语

| 马衡研究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马衡先生与中国文博收藏事业 郑欣森 5

马衡对西泠印社历史发展的影响 林如 12

马衡先生篆刻观论解 贺文荣 16

马衡与近代金石学 方波 20

从《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看西泠印社

第二任社长马衡的政绩 郑利权 23

马衡篆刻作品选 25

马衡家族考略 冯文华 28

近年出版马衡研究著作一览 叶莹 31

| 学术研究

虞山派篆刻历史钩沉

——林皋研究 归之春 34

明代印谱总目钩稽 古菲 41

| 艺林拾珍

林剑丹刻紫砂 49

康门弟子程澂: 诗人、印人、茶人 景迪云 52

| 典藏大展

第二届中国(杭州)艺术品收藏与鉴赏高峰论坛

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纪要 54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典藏大展作品选 55

| 社员成果介绍

《胡效琦戏剧文艺论集》、《胡效琦戏剧文艺论集续》 胡效琦 著 69

《瓦斋文存》 韩焕峰 著 69

《篆刻——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岐岖、李刚田 著 70

《元朱文印论谈》 沈乐平 著 70

| 社史勾沉

吴昌硕与诸闻韵 诸天觉 71



西泠印社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裙屐踟蹰，楼台掩映。回首良辰，俯仰陈迹，谁谓星移物换，光景常新哉。试忆曩时，叶君叶舟、丁君鹤庐、吴君潜泉，湖楼一榻，以研讨斯籀、抚刻印玺，为闲居消夏之乐。而王君福庵，时时从金沙港畔来会，优游洋兔，岁月清华。未几而印社成，印人聚，泉石增基藻绘，花草咸有精神。然苟非二三君子，有希古通方之雅，益以经营策画之劳，则江山虽美，未必即为人文之助也。

——《西泠印社志稿孙智敏序》

印社信息

- 西泠印社社友会与书画篆刻学院余杭分院揭牌 81
- 西泠印社社委会被评为2010年杭州市文物工作先进单位 81
- 西泠印社官方微博正式开通 81
- 金石流长 浙派遗风
- “西泠八家篆刻展”亮相杭城 82
- “西泠八家篆刻展”展品选 83
- “锦绣西湖——刘江西湖诗词篆刻展”
- 暨《刘江西湖诗词篆刻选集》首发式举行 85
- 千件珍品 世人共享
- 韩天衡向嘉定捐赠千余件艺术品 87
- 鲇背老人钟久安捐献印章两方 邓京 88
- 终极捐献
- 怀念钟久安先生 陈硕 90
- “逸笔清兴”乐庐四友书画展新春亮相杭城 92
- “一日之迹——唐存才、张炜羽、蔡毅强、夏宇、金良良五人篆刻展”开幕 92
- “洪亮书画篆刻艺术展”在辽宁朝阳市举行 93
- 沈慧兴、贺雪峰书画印作品在苏州展出 94
- 中国西泠网组织“西泠雅会——走进西溪” 94
- 西泠印社社员徐润芝女士逝世 95
- 荣宝斋总编辑、《西泠印社》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王铁全先生逝世 95
- 西泠印社社员、著名画家周沧米先生逝世 95

来稿选登 96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别署凡将斋，浙江鄞县人，寓居北京。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现代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篆刻家、书法家。早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24年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起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建国后任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著有《金石学概要》、《中国铜器时代戈戟之研究》、《新嘉量考释》、《石鼓为秦刻石考》、《汉石经集存》、《中国书籍制度之研究》、《凡将斋金石丛稿》等，印作编有《凡将斋印谱》、《凡将斋印存》等。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马衡先生与中国文博收藏事业

□ 郑欣淼

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至1952年调离，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其中19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文物为职志，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马衡先生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引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乃人生之“三不朽”，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令我们永远感念。

一

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上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马衡先生积极参加了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为捍卫和保存这个新生的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24年9月，爱国将领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临时执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煜瀛为委员长，决定延揽学者专家，点查古物，筹办博物院。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的马衡先生，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成立，业务部门分古物、图书两馆，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与张继任副馆长。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第一任理事会设理事9人，李煜瀛为理事长，马衡与黄郛、卢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沈兼士、袁同礼等为理事。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于北洋军政府的干扰，加上时局动荡，经费困绌，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故宫博物院，包括马衡在内的院内外进步人士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南京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

员”，但易氏“为国务所羁，不能亲采”，便电派在北平的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肖瑜、吴瀛五人为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

国民政府接管后的故宫博物院，渴望各项工作走向正常发展，国府委员经亨颐却认为故宫文物为逆产，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而国民政府竟通过了经的这一荒唐提案。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震惊和气愤，决定分头筹划对策。北平方面，由代表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的马衡等五人于7月8日拟写的传单，将故宫博物院创建经过、建院的必要性及经亨颐提案之不当等情况陈述于国人面前，并于7月9日借执行北平及各地军政要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邵力子、李济深、吴稚晖、张群等到院参观之机，将传单发给他们，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在南京的张继也呈文批驳经的谬论，易培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坚持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必要性。经过共同努力，经的提案被否决，决定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原决议案。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业务部门为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易兼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任副馆长。国民政府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组织条例》，任命了第一届37名包括党、政、军、文化、宗教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理事会理事，马衡名列其中。

由此可见，在马衡先生接任院长之前，他就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中坚，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院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数年间，他具体负责的古物馆工作，更是有声有色。古物馆虽先后俱是易培基任馆长，1927年11月江庸也任过馆长，但主要担子还是落在了马衡的身上。古物馆实际上是宫廷珍宝库，文物种类繁多，数量惊人。马衡先生对古物馆内机构的设置、业务的划分等，都有周密的考虑。依文物性质，馆内又设立了书画（书画碑帖）、金石（铜器、玉器、石器等各种文具）、陶瓷（瓷器、珐琅器、玻璃料器等）、织绣（织绣品及其材料）、雕嵌（雕刻或雕嵌之牙骨竹木漆等器）、杂品等6个部，主要业务为登录、编撰、流传、展览、典藏、装

潢等方面。马衡还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对本馆九课分掌事务作了详细规定。古物馆同仁积极布置、陈列展览及进行文物整理、传拓、刊印等工作，成绩显著，后又装箱南运文物，尽职尽责。马衡先生在其中不仅发挥了其熟悉古物的优势，而且展现了善于组织管理的卓越才能和细致、缜密、务实的工作作风。

1. 陈列展览。在各界人士捐资支持下，古物馆在内东路、内西路各宫次第成立各专门陈列室，1932年已达26处。其中主要有：钟粹宫前殿的“宋元明书画专门陈列”，后殿的“扇画、成扇专门陈列”；景阳宫前后殿的“宋元明瓷器专门陈列”；承乾宫的“清瓷专门陈列”；景仁宫前殿的“古铜器专门陈列”；斋宫前殿的“玉器专门陈列”；咸福宫的“乾隆珍赏物陈列”等等。此外，还保持、充实和改善建院初期在中路乾清门至坤宁门四周廊庑开辟的象牙、玛瑙、珐琅、景泰蓝、雕漆、如意、文具等工艺美术类文物的专题专项陈列。

2. 古物的继续清点和整理。这是故宫博物院当时的一项重要业务的工作。对于点查告竣的宫殿与文物，除有历史意义的宫殿保留原有格局外，凡与朝廷典制无关或不甚重要的配殿，均予整理装修，辟为文物陈列室。原贮藏其间的文物，则重新进行集中，再分类整理。例如提取乾清宫瓷铜玉器、慈宁宫牙骨器、斋宫等处书画、养心殿珐琅器、端凝殿古月轩瓷器等到古物馆，分类登记、整理，移送库房收贮。同时还开始了文物审查与鉴定工作，聘请专家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从事鉴定，主要鉴别文物名称与材质、考订文物时代、判别文物真伪。古物馆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三个审查委员会，马衡亲自主持铜器审查。

3. 古物的传拓刊印。古物馆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流传课，制订了一套较完备的传拓各种铜器的细则和钤拓古印的规则，对于物品的提送保管、材料纸墨的收发注销、拓工工作的监视以及出口拓片的印鉴登记等一切手续，都有严格的规定。从1929年到1932年，传拓达上百种，包括散氏盘、嘉量及宗周钟等。还把藏有秦汉铜印

1000余方的“金薤留珍”钤成印谱出售，由马衡等四人负责钤盖工作。为了刊印书画铜瓷等古物，古物馆1928年初就创设照相室，为古器物摄影，出版了多种专辑图录。仅《故宫书画集》就出了47期。

4. 古物馆重要文物装箱南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鉴于时局不断恶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将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图书、文献、古物三馆，装箱难度大不相同，最难的是古物馆，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极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硬，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箱时各有困难。在马衡先生领导下，古物馆的同仁积极想办法，克服种种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按时完成了任务。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对石鼓的装运，更是渗透了马衡先生的心血。原存于国子监的10个石鼓，由故宫博物院代运。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有不慎，石皮就会剥落下来。马衡先生负责石鼓的迁运，并认真研究装运的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记述：“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泉纆（麻绳），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没有发现新的伤损。

二

马衡先生1933年7月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次年4月实授院长。他是因易培基院长被诬盗宝而被迫辞职后上任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是令社会关注并为一些人所觊觎的职务。但等待马衡先生的却是沉重的担子。此时文物南迁基本告一段落，文物的整理、存储为首要任务，再加

上，八年抗战中，南迁文物又在西南后方辗转疏散，备受艰难。从1933年后半年到1945年，马衡先生带领故宫同仁，为保护文物安全竭尽心力，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对故宫博物院留北平文物的清点及南迁运沪文物的点收，是马衡就任代理院长后所着重抓的一项工作。为此，他制订了与文物保管有关的《出组规则》；各馆处科组分别制订了办事细则；组成了“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对全院文物进行认真的分类、整理、编目，并办理文物审查。为协助文物审查工作，还颁布了《专门委员会设立章程》，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以及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委员会，由马衡院长聘任专家学者为委员，其中特约专门委员13人，通信专门委员52人，都是各有关专业领域的翘楚。

运沪文物的点查，从1934年1月开始，1937年6月完成。这些文物自北平装箱运出时，清册上只记了品名与件数，没有编造详细清册。这次点收则是按箱登记，核对检验，铜器、玉器、牙器，都要记明重量。瓷器，还要标明颜色、尺寸(包括口径、底径、腹围、深度等)、款式，有无损伤，巨细靡遗。点验过的文物全部钤盖上“教育部点验之章”。此外，又将每日点查结果汇集整理，定名为“存沪文物点收清册”，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著录。

故宫本院留存文物的点查，于1935年7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点查仅登录品名及件数而没有详细登记，一是考虑文物数量大，来不及细查；二是考虑需要日后进一步对全部文物分类整理编目，因此只着重于首先点清留院文物品名、数量，其他工作留待以后再做。这次点查成果颇丰，凡清室善后委员会于仓促中遗漏者，或载于清室旧目从未发现者，皆逐件检出，并予以补号登录。

与此同时，马衡院长亦为建立南迁文物的保存库呼吁努力。1936年8月，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完工。这座三层的钢骨水泥建筑，存放着从上海转迁的故宫文物。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马衡院长决心在此多干一些事：立即准备修葺朝天宫大成殿、崇圣殿等

处，决定一一辟为陈列室，同时计划添置陈列柜，调节照明设备，定做文物储藏柜，进行藏品编目工作等等。但南京分院成立以后历时仅半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日趋紧张，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奉命再向西南后方疏散，或称“西迁”，从1937年到1945年，这一迁又是八年。这八年中故宫同仁以储藏整理、保护文物完整为首务。尽管备尝艰难，险象环生，有的工作人员还付出了生命，但人们无怨无悔，忠于职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自己所承担的神圣责任的深刻认识。正如马衡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力维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马衡院长在这八年中策划调度，鞠躬尽瘁，功莫大焉。

文物西迁后，随同西迁文物到后方的工作人员，分散在各个文物存放处，负责文物的日常保管与维护工作。在重庆设立总办事处，由马衡院长率领一部分人驻守，进行统一调度与安排。

在文物疏散过程中，文物储放的具体地点由马衡院长通过实地考察来选择、确定。第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后，他即赴长沙视察，作出了在湖南大学后方岳麓山爱晚亭侧开凿山洞以存贮文物的决定。因形势骤变，又奉令将这批文物运往贵阳。马衡院长亲往贵阳视察，觉得最安全的是山洞。他费了七八天工夫，看了几十处山洞，后在安顺县南门外5里找到一个华严洞，洞外还有庙，有公路直达洞口，是比较理想的地方。便请了工程师设计，在洞内搭盖两所板房，上盖瓦顶以泻滴水，下铺地板以隔潮气。第二批运往重庆的文物，未批尚未到达，行政院命令限期把存渝文物及正自北路运往成都的文物运出重庆与成都，另外觅地贮存。马衡院长即与押运文物来渝的院里同仁，将存渝文物疏散到距乐山县城20里的安谷乡，择定大佛寺及六姓宗祠为存储仓库。第三批文物从陕西宝鸡到汉中后，敌机轰炸汉中机场，为避空袭，马衡院长选定成都东门内大慈寺为仓库，把汉

中文物迁存于此。后根据行政院的命令，又决定迁移峨眉县，存在县城西门外武庙及东门外大佛寺一带。对于文物的妥善保管，马衡院长更是时刻注意，以求万无一失。

这是中国人民保护珍贵历史文物的壮举，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

对于马衡院长在抗日战争中保护文物的功绩，郭沫若先生有一段恰当的论述。他说：“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衡院长领导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组织西迁文物东归，接收流散文物，并顺应历史潮流，依靠进步职工，使南京政府空运北平本院文物珍品去台湾的妄想落空，拒绝了要其赴台的电令，毅然选择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北平本院的复原是整个复原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北平沦陷初期的故宫博物院曾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现状，请示机宜。行政院要求留北平职工“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当时，马衡院长及院内一些主要人员大部分已南下，或转往他处，院内工作则由总务处处长张廷济负责维持。留守职工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抗战胜利之初，由于马院长在重庆筹组西迁文物东归，一时不能返回北平，北平本院方面的复原工作就委托文献馆馆长、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会同留守北平的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廷济负责办理交接事宜。接收工作进展顺利。院里职员，十之八九为抗

战前的旧人，全部留任，只有伪院长及少数敌伪派驻的高级职员免职。机构设置仍如旧制。马衡院长、各馆馆长、总务处长都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接管古物陈列所也是抗战复原中的一件重要工作。1914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占有故宫外朝的几个主要宫殿，故宫博物院只占用内廷部分。1930年10月，易培基院长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的议案，行政院同意将设立在紫禁城外朝的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后因有人对合并提出不同意见，加之东北沦陷，时局不宁，合并工作一直未能完成。1946年12月，南京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古物陈列所合并到故宫博物院。1949年3月，整个交接工作完成，故宫作为一个整体由故宫博物院管理。

正像当年精心策划把南迁文物运往西南一样，马衡院长又忙于筹办这些文物的出川东归。早在1946年1月以后，这些在四川三地储藏的故宫文物就分头集中到重庆，到1947年年底以前全部运回了南京。但碰到的困难也不少，即如石鼓，在重庆本拟用船运输，因太重改装10辆汽车从陆路出发，原拟取道川、湘、赣、皖、苏公路直达南京，但因很多地段公路损坏，桥梁失修，途中甚至两次翻车，加之汽车又大都破旧不堪，行车速度极慢，到南昌后不得不改行水路，从南昌转道九江用船装运，在九江又等了24天才租到船只，到南京已用了近两个月。

故宫博物院此时还陆续接管和收购了许多散失在外的故宫旧有文物和物品，接收了一批私人收藏家捐献的文物，其中不少是具有极大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品。有天津溥仪物品，合计1307件；有北平清宗人府余存的834册玉牒、册簿等，陈仲恕收存的501件汉印，法兰克福中国科学院友谊会的741件古物图书，存素堂的3319件丝绣、铜器、玉器、象牙、书画等文物。接收个人捐献的，主要有郭葆昌的“郭瓷”和杨宁史的“杨铜”。郭葆昌对瓷器以“精鉴别，富收藏”闻名中外。他收藏的瓷器、书画都极精良，曾任故宫博物院陶瓷、书画审查委员，于抗战期间去世，藏瓷为其子女数人所有。马衡先生很重视这批瓷器，他对去平津地区清理文物的王

世襄先生说：“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京要注意这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王世襄先生费了好多周折，终于使427件珍贵瓷器入藏故宫博物院。杨宁史是德国侨商禅臣洋行经理，在北平沦陷期间从市肆收购古铜器、兵器240余件，多是当时河南等地出土的。

“杨铜”中有极为重要的器物，如经唐兰先生定名为宴乐渔猎攻战纹的战国铜壶，商饕餮纹大钺及鼎、卣、爵杯、玉柄钺等，艺术价值极高。杨宁史1946年将这批文物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特为他辟专室进行展览。

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还参加了南京有关方面举办的展览。在参加1946年10月教育部举办的“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京沪名人私人藏品展览”时，马衡院长表现出的可贵的职业责任感，令人称道。按教育部要求，马衡院长和故宫人员从“杨铜”陈列室中选了数十件精品参展。展览期间，傅斯年、李济等来参观，盛赞“杨铜”中的宴乐渔猎壶，并提出将这批青铜器暂留南京，把花纹、器形拓完一份后再送回北京。李济先生时为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又是故宫博物院理事，傅斯年先生更是马衡的老熟人。但马先生不顾情面，当面婉言谢绝。他说，这些铜器是从新辟的“杨铜”专室中提出的。因精品已去，北京的陈列室只得暂时关闭，如留在此处传拓，陈列室开放延期，观众会有意见。他马上叫随行的王世襄把带去的几份拓片，包括铜壶的花纹展开图送给李济，以免他们再提出要求。事后，马先生对王世襄说，铜器留在此处，夜长梦多，说不定他们要打什么主意，还是早送回去为妙。笔者曾专访过王世襄先生，王先生对马衡先生离开北平时要求他把参展铜器拓印一份的决定十分叹服，认为马先生很细心，料事如神。

1948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行将解放东北全境，全国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理事王士杰、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在南京开会决定，把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运往台湾。行

政院又函电马衡院长启程赴南京，并囑选择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与南京分院的文物一同迁往台湾。当时马衡先生在解放区的亲属，通过地下党组织和他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尽可能使北平文物的空运不能成为事实。在高级官员中，马衡始终是无党无派的。在这重要关头，他作出了保护国宝，拒绝赴台的决定。他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他一贯以研究与保护国家的历史文物为己任，完全从对祖国的利害得失，视政治形势的顺逆和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当南京政府忙于作逃离准备并挑选南迁文物拟运台时，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却镇定自若，继续推进各项业务工作。1948年11月9日，他主持召开了故宫复原后的第五次院务会，讨论决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如清除院内历年积存秽土，修正出组与开放规则，把长春宫等处保存原状辟为陈列室，增辟瓷器、玉器陈列室及敕谕专室，修复文渊阁，继续交涉收回大高殿、皇史宬等。马衡院长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决心。

南京分院迁往台湾的文物，先后于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949年1月29日分三批自南京起运。北平本院的文物迁运工作，却一拖再拖。马衡院长在职工警联谊会 and 高层职工的支持与配合下，先是布置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的工作人员，编写可以装运的文物珍品目录，报南京行政院审定；然后又让准备包装材料，并告诫有关人员“不要慌，不要求快”，绝不能因装箱而损伤文物；至于装箱工作进展如何，他却从未催问。他还于1948年底下令将故宫对外出入通道全部关闭，严禁通行，致选装文物精品箱件无法运出。南京分院虽函电催促，马院长则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为由拖延。其时解放军已进关，形势日新，直至北平和平解放，故宫文物一箱也未运出。

1949年1月，北平对外交通断绝，南京政府派专机接运文教界名流，马衡院长1月14日致函南京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杭立武，以病后健康未复婉拒赴南京。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3月6日故宫博物院被北

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马衡先生留任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均留原工作岗位，职薪不变。故宫博物院各项工作陆续恢复并有新的进展。1949年9月，故宫博物院开辟了“帝后生活陈列室”、“禁书陈列室”、“纺织陈列室”、“玉器陈列室”。1950年10月举办“清代帝后生活与农民对比展览”、“国内各民族文物展览”、“清代帝国主义侵华史料陈列”、“清代昇平署戏曲资料展”等。1952年1月，故宫博物院明代馆、钟表馆和“乾隆时代装潢陈列艺术展”开放。1950年1月，南迁文物第一批1500箱从南京运回。1951年11月，根据周恩来总理批示，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和马衡院长等从香港以重金赎回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并入藏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衡院长为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全面恢复及以后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打下了基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

马衡先生是金石学大师。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他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献资料，以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宋人欧阳修的《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其后吕大临、赵明诚等的书为铜器、石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代有著作，特别是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之学大为发展。不少学者通过对金石的研究，补载籍之缺失，考文字之演变，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对史学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但其研究范围仅限于对古器的分类定名及对文字的考释疏证，其研究方法也是孤立的、支离破碎的。19世纪末，殷墟甲骨、西北简牍、齐鲁封泥、燕齐陶器等纷纷出土，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扩大了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马衡先生总结金石学研究的成果，并使之系统化，写出了《中国金石学概要》。这部著作对金石学这门学科的含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它和史学的关系

等，都加以系统论述。马先生以他金石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对于旧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大作用。

马先生重视和提倡科学的考古发掘，并亲自参加发掘实践。他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一些宝贵经验，又不因循守旧，倡导用西方近代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方法丰富中国的金石学。他突破了旧金石学足不出户的书斋式研究，主张到野外实地勘察和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他说：我们所以要研究历史，并不是想复古，是要晓得我们的老祖宗怎样工作和生活的整个知识，“所以要讲考古，是非发掘不可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他多次主持或参加野外考古和调查，如1923、1924年赴河南新郑、孟津、洛阳等地现场调查，1928年参加辽东半岛“貔子窝”的发掘工作，1930年主持燕下都的考古发掘。马衡先生从一位金石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历程，说明他既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又是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

马衡先生金石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中。除金石学概论，他在铜器、度量衡制度、石刻、石经和书籍形制等方面都有开创性贡献，为世所重。

马衡先生又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1934年，马衡院长与北平图书馆馆长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傅斯年等联络博物馆界，倡议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1935年4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通过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大纲》，确定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推举马衡为会长。协会下设专门委员会负责博物馆学术研究，博物馆建筑和陈列，审查出版博物馆学术专著和论文，召开学术讲演等。协会还编印刊行《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两月一期。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成立，促进了博物馆学术研究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会务陷于停顿。1948年6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京复会，修订《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

大纲草案》，马衡先生再次当选理事长。复原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故宫传心殿召开，马衡主持，列出了：编印《中国博物馆一览》、每月出会刊两期、举办学术讲座、编印会员录、每年编印国宝审查报告并编印《国宝集》等工作计划。

马衡先生1952年离开了他以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心情当是很复杂的。但他对故宫的挚爱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升华。也就在这一年，他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4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又把1.4万余件(册)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有青铜器、印章、甲骨、碑帖、书籍以及法书、绘画、陶瓷、牙骨器等，种类繁多，数量惊人，精品不少。这是马衡先生日积月累收藏的，花费了他一辈子心血，现在全部捐给了国家，捐给了与他的生命联结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这批文物不仅有着巨大的价值，而且其中表现出的马先生的品格和襟怀更是培育故宫人精神和形成故宫传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凡德业足以盖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引自“中国博物馆协会会议记录(1948年6月6日—9月19日)”)故宫人永远感念马先生，全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在马先生逝世50周年时，故宫博物院特举办马衡先生捐献文物展，选出200多件珍品，以飨世人，同时出版其佚文集，以缅怀他的不朽功绩。

附：马衡捐献文物精品

青铜器

马衡先生毕生研究金石文字，是位知识渊博，成就卓越的学者。先生捐赠品中，许多是他本人用来研究的文物资料。如青铜的斧、斤等，在其著作中就曾对它们有过精辟的论述。

碑帖拓片

马衡先生毕生搜集石刻拓本12439件(含复本)，其中以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碑版、造型、石

经为主要部分。这批拓本是他研究石刻的重要根据，其中不少拓本上有他的题跋。1955年先生去世后，家人遵嘱将他收藏的石刻拓片悉数捐献故宫博物院，成为院藏碑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工艺品

马衡先生在古器物不断出土的情况下，也扩大了自己金石学研究范围，除金石外，涉及甲骨、竹木、砖瓦、陶瓷、玉器，从其收藏的陶器、漆器等也可见一斑。先生还十分重视野外的实地勘察和科学的考古发掘，主张“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先生对于近代中国金石学向考古学的过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书画

马衡先生一生耽于笔墨，能诗词，擅书法，精篆刻，其篆、隶、行、草皆能，作品具商周金石遗味，书风古雅自然天成。先生将笔墨与篆刻相联结，深得法度，形成独特的风格。

图书

马衡先生是位颇具特色的藏书家，共藏书1600余部，经整理并详细著录者为1275部，计14962卷。悉数由其子马太龙、马彦祥遵嘱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度藏。

原文刊《马衡捐献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作者简介 郑欣森：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本文责任编辑 叶莹】

马衡对西泠印社历史发展的影响

□ 林如

关于马衡先生，被人们提及最多的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他在任故宫博物院期间主持故宫文物南迁、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所作的重大贡献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对于书法篆刻家的马衡，以往的研究则比较匮乏，在近十几年来逐渐进入学者及书法篆刻家的研究视野，尤其在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以后，对于西泠印社史的研究进入高潮，特别是社员的考证和研究方面，无论是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还是史上记录的六位社长，或者是西泠印社的诸多早期社员、赞助者等等，都有了长足进展，而作为西泠印社史上所记录的六社长之一的马衡与西泠印社的关系，由于所处年代和时局的特殊性，以及史料的匮乏和扑朔迷离等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成为众多学者考证、探究和争议的对象。

对于马衡曾任西泠印社社长之职，虽然在目前所掌握的马衡本人留下的资料中，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在诸多的马衡与西泠印社的交往线索，以及有关西泠印社的文件资料中可以得到证明，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出版的由阮性山、韩登安撰《杭州西泠印社》、《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以及1957年所编的《西泠印社志稿·志人》、1988年沙孟海所作《西泠印社八十五年碑记》中都有明确记载，^[1]这也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在这些史料中，唯一并且到目前为止一直存在争议的是，马衡是否为继吴昌硕之后的第二任社长。

根据以上所提四种材料，有两种说法，《西泠印社志稿》、《西泠印社八十五年碑记》中记载是马衡为第二任社长；而《杭州西泠印社》、《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则记载是继吴昌硕之后，哈少甫为第二任社长，由于哈氏旋即去世，改推马衡为社长。如按后者所记，实际上马衡应该是第三任社长。历史真相到底如何，目前还是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1957年所编《西泠印社志稿》是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审定，而1988年《西泠印社八十五年碑记》则是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所作，以两人的身份地位，所说理应极具权威性。然而又有学者的研究提出诸多疑点。^[2]特别

是对《西泠印社志稿》的说法是否可信提出疑问，其理由是：《西泠印社志稿》成书于1957年，距第一任社长吴昌硕去世已有30年，因此，早于《西泠印社志稿》的民国时期由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阮性山、韩登安所编之《杭州西泠印社》，以及由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提供资料编纂的《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应该更为可靠。另，1948年戊子题名的已故社员名单中有哈鹰的名字，但在《西泠印社志稿·志人》所列61位社员中却消失了。而《西泠印社志稿》的最终审定者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那么，极大地可能就是有关哈鹰的这段史实被人为地删除了，但为何删除此段，就不得而知了。而沙孟海关于马衡继任吴昌硕为第二任社长只是沿《西泠印社志稿》所说而已。仅此可见，哈鹰曾任西泠印社社长一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然，也许基于当时哈鹰的书画艺术成就及影响与第一任社长吴昌硕无法相提并论，虽有同人推举，但社员们未必一致赞成其继任社长；也许因为哈氏“旋归道山”，使其任社长一事终究议而未决。无论如何，在没有铁证之前，我们还是以《西泠印社志稿》之说为准。

除马衡是否为继吴昌硕之后的第二任社长的争议外，学者们也试图考证马衡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大概时间。一是1930年说。《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7辑以及马衡之子马文冲都持此说。^[3]而研究者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当时马衡虽确实身在杭州，且避难于西泠印社，此有马衡当时的自作印、为他人所作序文以及与印社中人的交往印作为证。^[4]但根据当时马衡的实际状况，出任社长一职可能性并不大。二是1948年说。陈振濂所作《西泠印社社长二考》一文推断马衡正式出任社长的时间是1948年，在任七年。有学者提出的质疑理由有二：其一，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中就已有了马衡任社长的记载，为何1948年才正式在活动中由全体社员推定？公布结论与商议推定的时间不符合逻辑。其二，在马衡藏品中有许多印款、题识中称马衡为“叔平社长”，时间均早于1948年。而最早的是在1939年，因此推断马衡至少于1939年前已经

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最有可能是1934年至1939年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直到1955年。^[5]笔者认为，第一个质疑尚且可说，第二种质疑则颇可商榷。西泠印社中人的“社长”所称，并非仅指职务，也有尊称之意，对年长社员或者早入社的社员也可称为社长。如1935年西泠印社社员童大年为高时丰贺寿，绘“福山寿海”立轴，其上款为“存道社长兄先生”，等可为例。^[6]林乾良先生在《奇特之哑谜印》一文中针对韩登安先生所刻印章边款“离乱以来，不晤杰人（按：王杰人，字冷舟，浙江山阴人）社长三载矣”一句解释道：“所谓社长，非有职位，仅为社友之尊称而已。”^[7]

马衡究竟是不是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他到底何时任社长之职，也许在新史料被不断发掘以后，终究会有确凿定论。无论结论如何，马衡与西泠印社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西泠印社史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无容置疑的。

马衡对西泠印社的直接影响和贡献，主要在身体力行参与印社建设、保护和各项活动，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西泠印社成立初期，积极参与捐款捐物。西泠印社创立初期，社内物品和印社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依靠社员们的捐赠以及当时赞助人的捐助，这在早期的西泠印社文献中都有所记录。^[8]马衡就是积极参与捐赠的其中一位。见于记载1910年一次性捐大洋50元，物品有：磬式茶几四张，靠背一字椅八张，大方几桌一张，圆桌面一张。为早期西泠印社的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第二，不遗余力提携西泠印社社员，扩大西泠印社影响力。马衡早在西泠印社草创时期，就已名列社籍。与之有密切交往的西泠印社社员除创社四君子吴隐、王福庵、丁辅之、叶铭外，还有吴昌硕、唐源邨、钟以敬、张鲁庵、方介堪等人，尤其与吴隐、王福庵、丁辅之交往颇深。马衡在实际主持故宫博物院工作之后，不断提携西泠印社社员参与故宫博物院工作，以他在政界、艺术界、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故宫与西泠印社之间架起了学术交往的桥梁。比如，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不久，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策划重拓乾隆时期编纂的内府藏古玺印《金薤留珍》出版，举荐邀请王福

庵、唐源邨等西泠印社社员负责钤拓工作，使王、唐二人的专长得以施展；1928年马衡在北京倡导成立“圆台印社”，聘请王福庵为导师；也是由于马衡的举荐，王福庵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王福庵于1920年初到京城时鲜有人知，经过马衡的推崇和宣扬，遂名扬京城，不仅提高了王福庵个人名声，也使更多人了解了篆刻、了解了西泠印社，扩大和提升了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

第三，对西泠印社的保护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马衡虽经常来往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但主要工作还在北京，因此有“远客京师”、“遥领社职”之说。然马衡人虽未在，心却时常记挂着印社，并以保护印社为己任。史料记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次，宋美龄到杭州游玩，提议把孤山改为中山公园。听到这个消息，丁辅之立即写信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量，采取自我保护办法。巧遇1929年正在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西泠印社、俞楼、广化寺等处为卫生所，10月20日闭幕。博览会结束后，立即挂起‘古物保管委员会浙江分会’的牌子。这样，免去被更名的可能。”^[9]马衡以一己之力使西泠印社躲过一劫，得以留存。

马衡对西泠印社的间接影响和贡献，在于他对篆刻艺术和学术方面的不断研究探索，他的研究所得成果，对西泠印社的篆刻创作地位和学术影响力，对西泠印社早期金石学，以及后来篆刻学学科独立，都产生了非常积极作用。

马衡以金石考古、文物保护闻名于世，殊不知他对于篆刻艺术也极为精通。早在寓沪时期就与篆刻名家吴昌硕、赵叔孺、吴隐等切磋印艺，并为许多当时的文化名人治印，如钱玄同、胡适、郭沫若、于右任、董作宾、徐悲鸿等人，均请马衡刻过印，可见马衡当时在海上的印名。马衡精于金石，长于篆法，篆刻强调篆文与笔意，师宗秦汉又能自有新意，以金石为底蕴，格调自然不同凡响。马衡篆刻艺术作品可见于《端庐印稿》、《凡将斋印谱》、《凡将斋印存》。^[10]仅从篆刻艺术成就的影响力来看，作为西泠印社社长也是当之无愧的。

在篆刻学术方面，马衡著有《凡将斋金石丛稿》刊行于世，不仅是金石学巨作，对篆刻也有极为精到的见

解，并且对于金石学与篆刻学学科提出了相互作用和区分界限，无论从金石学对早期西泠印社的影响，还是篆刻学对后来西泠印社的发展来看，都是意义巨大。

马衡早在民国时期发表于《说文月刊》的《谈刻印》一文中就非常明确、全面地阐述了“印学”与“金石学”的不同概念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马衡先生认为：

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视金石学矣！盖金石者，乃指金文及碑版而言。金文者，商周以来铜器之文字；碑版者，秦汉以来刻石之文字也……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11]

马衡指出了金石与篆刻的概念并不能等同，但他认为研究印学必须研究一切金石文字，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充分反映了马衡强调篆刻必须依附于金石，必须以金石学为前提的学术主张。这与早期西泠印社社员以金石家自居，宗奉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社旨的理念都是相当一致的。而西泠印社正是因为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篆刻一技，而是在金石背景的支撑下不断发展壮大，扩大自身的学术研究范围和影响，才能使这一以印学为名的社团顽强生存下来。这样的例子可以有很多，比如《汉三老碑》的抢救和保存，“金石家书画展”的举办和《金石家书画集》的编辑出版等等，都是在金石背景下西泠印社进行的诸多活动。在与西泠印社有关的人和事中，以金石为名的篆刻艺术活动或篆刻家超出作为篆刻家的艺术职业范围所进行的有关金石方面的活动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西泠印社成立30周年时举办“社友近藏金石家书画陈列展览”，并由西泠印社上海书肆出版发行了《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册·金石家书画集二集》，共收金石家、篆刻家220家，其中西泠印社社员两位：胡夔、吴昌硕。西泠印社

社员黄宾虹于1926年发起成立了“金石书画艺观学会”并主编了《艺观》杂志。^[12]由此可见，马衡强调的金石学对于篆刻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篆刻以金石为支撑，为西泠印社早期的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

马衡在《谈刻印》中明确指出了篆刻与金石的概念不能等同，但他认为金石学可以独立，而篆刻学必须依附于金石学，更没有提出篆刻学可以成为一独立的美术学门类。当然，在马衡的时代，并没有清晰的学科概念，自然不足为奇。但是，在西泠印社早期，篆刻家们还以金石家自居、篆刻与金石概念混淆的时候，马衡就以他的睿智提出了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异，这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篆刻学开始从金石学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艺术学科，并为大多数人逐渐接受提供了先声。1983年，在西泠印社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先生致开幕词，其中谈到了印学与金石学的关系：

印学、篆刻学的形成，是近六百年的事。搞这门艺术的一向存在“自卑感”，怕别人讥笑它是“雕虫小技”，因为研究古代印章是金石学中间的一个项目，所以篆刻家们往往依托金石学的牌子，自以为金石家，别人也给他金石家的美称，由来已久。实质上，宋以来所称为金石学，主要是指研究商周铜器和历代碑版之学，与篆刻仅有极小部分关系，并不等同。金石学是史学、考古学方面一门学问，篆刻学是美术方面一门学问，两者虽有联系，但不是一物……篆刻学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学术地位，不需要再顶金石家的“老招牌”。^[13]

沙孟海先生站在现代学科概念的立场上，明确提出反对以“金石”代替“篆刻”，反对在篆刻界提出的“金石书画”的笼统口号。这虽然曾遭到西泠印社一批老社员的反对和质疑，但从现代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说，“篆刻”、“金石”属于不同的、独立的学科范畴，篆刻应该回归到艺术学科中来，不与纯学术的“金石”概念相混淆，已然成为“篆刻”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泠印社在新时期的发展，也正是因为“篆刻学”学科的独立，从而规定和明确了自身的艺术发展道路。在创

作上主张篆刻应该回归到艺术中来，篆刻要走向艺术创作，走向现代，强调篆刻本身的形式、技巧、风格等作为艺术创作的要求，但同时也并不排除金石学、文字学方面的相关内容支撑。归根结底，马衡当年对“金石”与“篆刻”概念的清理和确立功不可没。我们也看到，当代的西泠印社在保证“篆刻学”学科独立发展的同时，从不忘金石学问带来的支撑和提升作用，这样的发展道路与马衡对待“金石”与“篆刻”的理念一直都是不谋而合的。

因为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时期的特殊性，以及工作范围的限制，西泠印社史上对马衡社长的记载和研究远远不如如吴昌硕、沙孟海、启功等其他几位社长翔实丰富。但在西泠印社发展史上最困难的时期，马衡以他的赤诚之心身体力行，为建设西泠印社、保护西泠印社、发展西泠印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作为西泠印社社长，马衡自身的篆刻艺术成就，篆刻、金石学研究的成果和理念，以及他在艺术、考古、文物保护等学术、文化领域的卓越成就也使西泠印社在发展道路上明确方向，不断扩大天下第一名社的声誉和影响。可以肯定地说，马衡对于西泠印社的贡献和影响绝不亚于任何一位西泠印社社长。

【注释】

[1] 阮性山、韩登安撰《杭州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社长先后公推吴昌硕、哈麀、马衡诸人担任，社务则由创办人负责管理。”《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社长吴昌硕捐馆后，改推哈少甫为社长，旋哈氏又归道山，改推马衡为社长。”1957年《西泠印社志稿·志人》中马衡条：“马衡，字叔平，鄞人，工篆隶，善刻印，精鉴别，收藏书画金石碑版甚富，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继吴俊卿后为本社社长。”1988年沙孟海所作《西泠印社八十五年碑记》：“吴先生既歿，马叔平先生继任。马先生远客京师，韩登安先生以总干事处理日常社务。”

[2] 详见王幼敏《马衡与西泠印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十七辑：“1930年夏，马衡先生因检举孙殿英盗墓集团后，受到被通缉的威胁，遂化名‘无咎’，连夜经天津到达

上海。在沪期间，曾至杭州小住，这时杭州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已经去世，马衡被推继任该社社长。”

马衡之子马文冲：“（马衡）逗留南方期间，曾在西湖西泠印社受聘担任一届社长。”

[4] 马衡自刻“马衡印信”印，印款为：“十九年七月旅杭时所作”。又“无咎无恙”印，印款为：“十九年八月作于西泠印社”。叶铭刻“马衡”印，作于1930年的6月。

马衡为方介堪《古玉印汇》所作的序文中有记述：“今年夏，游杭州，寓西泠印社。”

[5] 《鲁盒仿完白山人印谱》，现藏北京故宫图书馆。该书出版于1942年，马衡所藏为1945年版，作者张鲁庵所赠。封二有张氏亲笔题识：“叔平社长指教，鲁庵张咀英。”

“马衡无咎”印，唐源邨刻，印款为：“叔平社长正，唐源邨，己卯三月。”此印作于1939年。

[6] 见《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271页。

[7] 《西泠艺报》第66期。

[8] 叶铭编著《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等。

[9] 王佩智文，《西泠艺报》192期，见《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230页。

[10] 马衡曾辑自刻印成《凡将斋印存》两册，后又编成《鐫庐印稿》、《凡将斋印谱》，1990年9月，故宫博物院建院65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组织将三本印稿选编成《凡将斋印存》，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11] 马衡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10月第一版，290页。

[12] “艺观学会”是由黄宾虹与几个爱好中国艺术的朋友所组织，《艺观》的内容以书画、篆刻艺术为主，然学会的名称则为“金石书画艺观学会”。

[13] 《沙孟海文集》，第63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6月。

作者简介 林如：浙江大学博士，现任教于浙江大学艺术学系。

【本文责任编辑 叶莹】

马衡先生篆刻观论解

□ 贺文荣

【内容提要】马衡先生的《谈刻印》一文可以看作是他的篆刻（印学）观的简要表述和系统展开。他反对将治印仅仅当作一门技艺，认为学术重于技艺，字法重于刀法，治印应该是学术之外的余事。印章用字取材宜多种多样，《说文》是文字学的必读书，但不必死守。马衡先生的篆刻以秦汉印为矩矱，追求雅正、规范、醇厚、古拙的审美趋尚，是典型的“学者印风”。我们以为，先生对于篆刻选用篆体入印理由的解释有失圆照，对于《十钟山房印举》未收第一时期印的论断不能成立。

【关键词】马衡 金石学 篆刻观

马衡先生撰有《谈刻印》一文，最早发表于《说文月刊》四卷合刊本（1944年），后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这篇文章虽以“谈刻印”名其篇，但通览全文，体严思深、言简义赅，且具有一定的学科结构，完全可以看作是马衡先生篆刻（印学）观的简要表述和系统展开。现不揣谫陋，将笔者拜读后的所思、所感撰成此拙文。这些所思、所感，有的类似于札记、笺注；有的则是献疑、存阙；有的是将马衡先生的治印或者古印印例与其篆刻观念相互印证；也有少数是提出与先生不同的观点，等等。

篆刻家应有的知识结构和对待篆刻应有的态度

马衡先生反对将治印仅仅当作一门技艺，在《谈刻印》一文中他将治印提高到学科和学术的高度，从金石学、印学、文字学、书法艺术和治印的关系的高度来谈治印。在厘清了金石学的概念和范畴后，他对篆刻家提出了要求：“印为古代用为凭信之物，或刻于铜，或刻于玉，或刻地名官名，或刻私人姓名，当然为史料重要部分，而在金石学范围之内。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1]马衡先生谈治印并不是直接谈刀法、字法、章法之类，

在辨析了刻印和金石学的关系后，他又宕开一笔，从古印谈起，自春秋战国而及明清，又兼及印章的名称、形制、钮式、文字与章法、材质与刻铸等诸项问题，纵横双维展开，俨然一部印学简史。此为印学与治印的关系。

治印与文字学的关系和文字学修养对治印的重要意义，先生在此文中也多次涉及。他强烈批评那些刻印，却不知六书为何物、印文多谬的印人。治印与文字学、书法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复杂的、立体的网状结构。马衡先生遵奉元吾衍的《学古编》为圭臬，他的这篇文章的思路和结构与《学古编》也相类。他说：

“（《学古编》）前半只言写篆书，后半始言刻印……可见刻印必自写篆隶始，吾丘氏固未常专授人以刀法也。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工艺。学习篆书，则关乎学术，古谓之小学，今谓之文字学，穷年累月，不能尽其奥藏，其难易岂可同日而语哉？”^[2]

就书法和治印的关系而言，治印是一种写和刻的合璧，故而刀法者，不过是传笔法之神韵也。马衡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引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提到的唐颜鲁公、李邕自写自镌碑刻的典故来论证书法和刻印的关系。明人费瀛的《大书长语·漆涂》也有相似的记载，不过却说颜鲁公常令家僮镌刻，并未提及鲁公自镌自刻的事，而说钟繇和李邕多自书自刻，其云：“颜鲁公书碑文，每令家僮镌刻，犹憾波磔时有失真。钟繇、李邕多自书自刻，旁书伏灵芝刻及黄仙客刻，皆自撰诡名耳。”^[3]关于碑的写与刻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写手和刻手并非同一个人。宋人米芾和书学泰斗沙孟海先生的论断可为代表。华人德先生以魏碑《郑长猷造像记》为例，将写手与刻手的关系问题推向更深入。^[4]周亮工提到的颜鲁公、李邕自书自镌碑刻的问题，是一个有趣且意义重大的论题，但是目前还没有充足的文献，俟考。不过，他用此例论证书法和刻治的关系，认为印章必自写自镌才能传神，却也是十分恰当的。

从马衡先生此文，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以儒家观念为归宗，以学术研究为基本立场的文艺观。他说：“刻印为研究文字学者之余事，不必成为专家，北海鲁公何尝